

宋代雕版印刷之政教指向 ——印刷傳媒之控制研究

張高評*

提 要

圖書複製之技術，從「倩人假手、躬自抄錄」，以抄書為讀書之寫本時代，發展到「日傳萬紙」，「士大夫不勞力而家有舊典」，鈔錄一變而為印摹，以印本替代寫本。印本之優長，在「易成、難毀、節費、便藏」，以及化身千萬，無遠弗屆。宋代雕版印刷之目的與使命，大抵有四端：朝廷右文崇儒，印刷圖書之使命主要在「宣索賜予，興教濟眾」；家刻坊刻則因時乘勢，功利務實，期許「布之四方，圖永其傳」。經史群書，或以之致用資鑑，或以之金針度人；至於觸忌犯諱之刊本，朝廷往往進行圖書監控，看詳禁毀。試考察書禁之理由：「鏤版鬻賣，書坊刊行：傳播街市，流布近遠，始自都下，傳之四方」，其生發之效應，令朝廷震懾禁止，卻使士人閱讀印本，喜愛接受，以至「禁愈嚴而傳愈多」。今參考西洋傳播學理論，借鏡經驗學派之傳媒控制與傳媒效果研究，以詮釋宋代雕版印刷之政教指向。由於印刷傳媒在興教濟眾，圖永其傳，致用資鑑，金針度人四大方面，配合政教指向，於是宋代號稱雕版印刷之黃金時代，兩宋三百年間，刻書之多，地域之廣，規模之大，版印之精，流通之廣，都堪稱前所未有，後世楷模，職此之故。

關鍵詞：雕版印刷、宋代、政教指向、傳媒控制、傳媒效果

*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特聘教授。

The Political and Pedagogic Policies of Engraving in the Sung Dynasty: A Study of Media Control in the Printing Business

Chang Kao-Pi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technique of printing business has evolved dramatically, from manual copies to engraved printing. With the emergence of engraving, the written copies, which were laboriously made, are replaced by printing copies. The advantage of the printing copy is fourfold: easy to produce, difficult to eliminate, cost effective, and convenient for collection. A plethora of copies can be printed effortlessly and circulate widely. As such, the engraving in the Sung Dynasty shoulders specific obligations and tasks which include as follows: first, since the Sung Dynasty regards highly of arts and the humanities, the royal government will give the printed books to courtiers or foreign delegates as presents or tokens of hospitality, and wishes to widen the dissemination of knowledge by so doing. Second, regarding to the engraved books in non-governmental circles, they are printed depending on public demand for commercial and financial considerations. The goal is to increase the circulation of books. Moreover, the literary canons and the annals of history are for self-reflection and practical guidance. Also, strict censorship of books that concern taboo subjects is introduced—for fear of spreading the banned books to the public. However, such imposition only widens the circulation of those banned books, and makes the books more precious to scholars. By demonstrating communication theories such as media control and the effects of media, the paper tries to apply them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political and pedagogic policies of engraving in the Sung Dynasty. Given that the

number of engraved book, the scale of circulation, and the exquisiteness of the woodblock has all reached their apex due to the smooth combination of governmental policies and the engraved books, The Sung Dynasty may be termed as the apogee of engraving.

Keywords: engraving, the Sung Dynasty, political and pedagogic policies, media control, effects of media

宋代雕版印刷之政教指向 ——印刷傳媒之控制研究

張高評

書籍是知識文化的載體，他的形制和生產方式，影響到傳播的質量，接受的廣狹，反應的博約。從甲骨、鐘鼎到簡帛，從簡帛到紙墨，從寫本到印本，其間有許多飛躍。尤其從謄寫抄錄的寫本，轉換成「日傳萬紙」的印本，號稱知識革命。印刷術在中古歐洲，被推崇為「神聖之藝術」、「變革之推手」、「催生文明之母」；在東方宋朝，雕版印刷崛起繁榮，是否如中古歐洲十五、六世紀一般，生發許多效應？這是印刷文化史的研究課題，值得投入研究。筆者最近完成《印刷傳媒與宋詩特色》一書，約 36 萬言，¹已作若干探討。今再從朝廷統一政治，昌明教化之視角，討論宋朝對雕版印刷正反兩極之態度，然後知雕版印刷之為傳媒，亦不免受「右文崇儒」政策之制約。

印本圖書作為知識信息傳媒，交付刊刻之當下，隱然已受政治教化之制約；而觸忌犯諱之印本圖書，縱然刊行流布，也難逃朝廷監控，輕則「看詳」，重則「禁毀」。雕版印刷為宋朝右文崇儒政策之體現，其政教指向由此可見。今翻檢史書、文集，採錄其中之圖書傳播史料，以及印刷文獻，斟酌參考西洋傳播學理論，借鏡經驗與功能學派傳播模式之論述，從控制研究的視角，討論傳播者對信息之採集製作，多已隱含政教之指向。而監本官刻之傳媒功能在「興教濟眾」，而家刻坊刻本在「圖永其傳」，經史群書之為印刷傳媒，功能指向為「致用資鑑，金針度人」；宋代印刷傳媒之效果分析，與西洋傳播學經驗學派論傳媒影響，所謂「議題設置模式」，²可以相互發明。

¹ 張高評：《印刷傳媒與宋詩特色——兼論圖書傳播與詩分唐宋》，（臺北：里仁書局，2008.3），頁 1-631。

² 黃曉鐘、楊效宏、馮鋼主編《傳播學關鍵術語釋讀》，〈經驗學派·議程設置模式〉：議程設置模式（the Agenda-Setting Model）亦稱「議題設置」，指傳播媒介愈是突出某命題或事件，公眾受容就愈發注意此命題或事件。而傳媒的議程，是由權力集團通過社會控制的微妙形式，發揮影響的結果。（成都：

一、從繕寫抄錄到雕版刊行

(一) 五代以前，寫本難得，動輒散佚

六朝以來，以楮墨鈔錄替代漆文竹簡，進入所謂寫本時代。此時，欲複製圖書，除謄寫鈔錄外，別無更佳途徑。於是，「倩人假手」、「躬自抄錄」，成為讀書博學、複製圖書之二法門。傳抄過程雖然曠日廢時，備極艱辛，然手到、眼到、心到、口到，紛至沓來，往往「所寫畢，誦之亦畢」，閱讀態度認真務實，唯恐滑易漏失，故受容豐厚，所得亦多，如下列文獻所云：

（蕭繹）為瑯琊郡時，蒙勅給書，并私有繕寫。為東州時，寫得《史》、《漢》、《三國志》、《晉書》；又寫劉選部儒家，謝通直彥遠家書；又遣人至吳興就夏侯亶寫得書，又寫得虞太中闡家書。（蕭繹《金樓子·聚書篇》）

余少好抄書，老而彌篤。雖偶見瞥觀，皆即疏記。後重省覽，歡欣彌深，習與性成，不覺筆倦。……幼年讀《五經》，皆七八十遍。愛《左氏春秋》，吟諷常為口實，廣略去取，凡三過五抄。餘《經》，及《周官》、《儀禮》、《國語》、《爾雅》、《山海經》、《本草》，并再抄；子史諸集，皆一遍。未嘗倩人假手，并躬自抄錄，大小百餘卷。不足傳之好事，蓋以備忘而已。（《南史·王筠傳》）

（蕭）鈞常手自細書寫《五經》，都為一卷，置于巾箱中，以備遺忘。侍讀賀玠問曰：「殿下家自有墳素，復何須蠅頭細書，別藏巾箱中？」答曰：「巾箱中有《五經》，于檢閱既易；且一更手寫，則永不忘。」諸王聞而爭效為巾箱《五經》。巾箱《五經》，自此始也。（《南史·齊宗室傳》）

蕭繹為梁武帝第七子，性愛典籍，曾謂「自聚書來四十年，得書八萬卷」，藏書如此豐富，大部分由借書抄寫而來。蕭繹貴為皇子，得書不必「躬自抄錄」，大多遣人「傭書」。王筠一生抄書四十六載，所謂「少好抄書，老而彌篤」，視愛賞貴重決定抄數，或「三過五抄」，或「再抄」，或「一遍」，難得在「未嘗倩人假手，并躬自抄錄」。親自抄書，可以明確感受體會書中精華要妙，王筠所謂「備忘」，

四川大學出版社，2005.8），頁72-74。

此真一針見血之論。蕭筠首創巾箱本，「手自細書寫《五經》，置于巾箱中，以備遺忘」。不同於宋元以後巾箱本者，在於「手自細書」。蕭筠貴為南齊宗室，所以手抄巾箱《五經》者，動機有二：其一，檢閱便易；其二，以備遺忘；所謂「一更手寫，則永不忘」。由此觀之，古人以抄書為讀書者，其關鍵就在「一更手寫，則永不忘」。南朝皇族或士人聚書，除傭書代抄外，³絕大部分人讀書，多不假人手，而躬自抄錄。漢魏六朝士人讀書，亦然，如：

（王充）家貧無書，常遊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眾流百家之言。（《後漢書》卷四十九，〈王充傳〉）

（班超）家貧，常為官傭書以供養。久勞苦，嘗綴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無它志略，……安能久事筆研間乎？」（《後漢書》卷七十七，〈班超傳〉）

（闕澤）居貧無資，常為人傭書，以供紙筆。（《三國志》卷五十三，〈闕澤傳〉）

（袁峻）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抄寫，自課日五十紙。（《梁書》卷四十九，〈袁峻傳〉）

王充家貧無書，過目不忘，一見成誦；班超為官傭書，久事筆研，乃投筆從戎。其他如闕澤，「為人傭書」；袁峻則從人借書，必皆抄寫，是以抄書為讀書，同時進行複製圖書。以抄寫複製圖書，曠日廢時；勞駕書傭，則成本書價不菲。書卷之價昂難得，致家貧而無力購書，於是「為人傭書」者有之，從人假借者有之，甚至「以寫經為業」。上焉者，「閱所賣書，輒能記憶」，其次，以抄書為讀書，亦能成誦。久事筆研，厚積薄發，亦能成學。其他如葛洪之借書抄寫，劉孝綽之「朝成暮遍」，左思〈三都〉賦之洛陽紙貴、齊文襄帝之書人，一日夜寫畢《華林遍略》，多可見書卷之難得，書價之昂貴，寫本傳播之樣式，如：

（左思）欲賦〈三都〉……，構思十年，賦成，皇甫謐為賦序；張載為注〈魏

³ 自南北朝至隋唐，複製圖書，時常假手「傭書」，許多士人傭書自業，因職業之便，寫畢，諷誦亦了，往往造就博學通儒。如王僧儒、朱異、劉芳、崔亮、蔣少游、蕭銑、崔行功、王紹宗等。參考劉光裕：〈抄本時期書籍流通資料〉，宋原放等：《中國出版史料》第二卷，（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10月），頁412-416。

都》，劉逵主〈吳〉、〈蜀〉而序之，張華見而歎曰：「班張之流也！」於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晉書·文苑傳》，〈左思〉）

（劉孝綽）每作一篇，朝成暮遍，好事者咸諷誦傳寫，流聞絕域。（《梁書》卷三十三，〈劉孝綽傳〉）

州客至，請賣《華林遍略》。文襄多集書人，一日一夜寫畢。退其本，曰：「不須也。」（《北齊書》卷三十九，〈文襄帝傳〉）

（晉葛洪）屢遭火，典籍盡，乃負笈徒步，借書抄寫。（明顧起元《客座贅語》卷二，〈稚川貞白相類〉引《別傳》）

左思〈三都賦〉，得張華品題，「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此時「競相傳寫」、「洛陽紙貴」現象，為寫本傳播增添光輝一頁。《梁書》推崇劉孝綽之文學造詣，作一篇而「朝成暮遍」，「好事者咸諷誦傳寫」，其效應為「流聞絕域」，文學傳播之「朝成暮遍」、「流聞絕域」，可見寫本傳播之影響。北齊文襄帝，能「一日一夜寫畢」《華林遍略》，可見書人「傭書」招集之多，而傭書為業人口之眾。葛洪恢復火燼之典籍，亦是負笈徒步，借書抄寫，以製作複本。商品經濟，供需相求，於歷代圖書傳播中始終居於外緣之促成作用。時代更迭，士人讀書求書，仍以「逢即寫錄」、「手自抄錄」，至有一抄、再抄，讀書不如抄書之說，如：

（穆崇）子子容，少好學，無所不覽。求天下書，逢即寫錄，所得萬餘卷。（《北史·穆崇傳》）

述好譜學，祕閣中見常侍柳冲先撰《姓族繫錄》二百卷，述于分課之外，手自抄錄，暮則懷歸，如是周歲。寫錄既畢，百氏源流，轉益詳悉。家聚書二萬卷，皆自校定鉛槧，雖御府不逮也。（《舊唐書·韋述傳》）

（柳仲郢）家有書萬卷。所藏必三本：上者貯庫，其副常所閱，下者幼學焉。仲郢嘗手抄六經，司馬遷、班固、范曄只皆一鈔，魏晉及南北朝史再，又類所鈔書凡十三篇，號《柳氏自備》。（《新唐書·柳仲郢傳》）

唐張參為國子司業，手寫九經。每言讀書不如寫書。高宗以萬乘之尊，萬幾之繁，乃亦親灑宸翰，遍寫九經，雲章爛然，終始如一，自古帝王所未有也。

又嘗御書《漢光武紀》，賜執政徐俯曰：「卿勸朕讀《光武紀》，朕思讀十遍不如寫一遍，今以賜卿。」聖學之勤如此。（羅大經《鶴林玉露》甲編，卷一，〈手寫九經〉）

北魏太尉穆崇之子穆子容，「求天下書，逢即寫錄，所得萬餘卷」，抄書之多，堪稱北朝之最；與南朝梁蕭繹之聚藏抄本書八萬卷，堪稱雙雄。李唐時，韋述好譜學，「手自抄錄，暮則懷歸，如是周歲。寫錄既畢，百氏源流，轉益詳悉」，手抄自錄之效益，體現在「百氏源流，轉益詳悉」。中唐元和間，柳仲郢家藏書萬卷，手抄《六經》、《史記》、兩《漢書》，及魏晉南北朝史，又類抄他書，旁錄仙佛，特別處尤在「所藏必三本」。張參手寫九經，每言「讀書不如寫書」，宋高宗「遍寫九經，雲章爛然」；且御書《漢光武紀》自惕自勉，所謂「讀十遍不如寫一遍」，寫書抄書之成效，由此可見。

由此觀之，自東漢蔡倫發明紙張，經六朝至隋唐，運用在文化傳播方面，即有抄本、藏本，媒介皆為寫本。士人積學儲寶，校定鉛槧，聚集墳典，便利檢閱，要皆躬自抄錄，手自書寫，蕭鈞所謂「一更手寫，則永不忘」，可作「以抄書為讀書」效應之寫照。蓋書卷獲致不易，故隨寫隨誦，寫畢而誦亦畢，故讀書所得往往精詳可取。在雕版印刷尚未普及昌盛時，抄寫書卷儼然成為複製圖書唯一而便捷之途徑。

相較於簡帛，寫本抄本有諸多便利之處，已如上述。然相較於印刷傳媒，寫本卻存在許多缺失與不便。謄寫抄錄，作為圖書複製之方法，一則費力難成，緩不濟急；二則成本過高，書價昂貴；三則產量少，流傳慢，四則抄手素質不一，文字錯漏難免；五則卷帙龐大，攜帶典藏不便；六則抄本複本無多，容易散毀亡佚。

尤其是複本不多，動輒散佚，更是圖書傳播之致命傷：白居易手編詩文集，謄寫三部，度藏三處；然宋代所傳，並非上述抄寫本。⁴北宋慶曆間編《崇文總目》，凡三萬六百六十九卷；徽宗大觀四年（1110）按籍求之，「十纔六七，號為全本者不過二萬餘卷，而脫簡斷編、亡散闕逸之數浸多」；⁵李清照〈金石錄後序〉稱其遭

⁴ 萬曼《唐集敘錄》、《白氏文集》敘錄，（臺北：明文書局，1982.2），頁 239-240。

⁵ 《宋會要輯稿·崇儒四》，徽宗大觀四年五月七日，秘書監何志周言，（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1.9），

遇靖康之難，從「故第書冊十餘屋」，到明誠病亡時，「猶有書二萬卷，金石刻兩千卷」；迨渡江南來，「書又散爲雲煙」，「巍然獨存者十去五六」；後又遭人盜取，已是「十去七八」。⁶書籍之聚散如此，其中若屬寫本、稿本，此一書厄將是萬劫不復，所謂「艱難以來，兵火百變，文書之厄莫甚今日」。高宗下詔稱：國家藏書「艱難以來，散失無在。朕雖處干戈之際，不忘典籍之求；每令下於再三，十不得其四五」。⁷有上述諸多「不便」，於是有印刷圖書之崛起，與寫本競奇爭輝，共同致力於知識傳播之使命。

（二）北宋之後，版本大備，士庶家皆有之

圖書傳播之媒介，由上古之書諸竹帛，進化到中古時代的寫卷，演變到近代的雕版印刷，便捷易得，利用厚生，堪稱知識革命；雕版圖書化身千萬、無遠弗屆之傳播魅力，蔚爲印本文化之形成。西方學界研究谷登堡（Gutenberg Johann，1397-1468）發明活字印刷，引發 15 世紀中古歐洲之種種變革，如「印刷術發明最基本的影響，在於它帶來書價的降低，和書的相對平凡化」；「印刷的發展，和它的通俗化，深刻改變了閱讀的環境。可以隨處進行閱讀，無論是在國外，旅途中，還是在任何一個房間裡」；⁸相形之下，十一世紀的東方宋朝，雕版印刷作爲圖書傳媒，崛起於寫本、藏本諸傳統知識傳媒流傳久遠之際，其傳媒效應，與谷登堡之變革與影響，相近相似，可以相互發明。相較於寫本，印本明顯有若干躍進，北宋士人蘇軾多能言之：

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蘇軾文集》卷十一，〈李氏山房藏書記〉）

頁 240。

⁶ 李清照〈金石錄後序〉，徐北文主編《李清照全集評注》，（濟南：濟南出版社，1992.5），頁 213-214。

⁷ 同註 5，紹興十三年（1143）七月九日，內降詔曰，頁 251。

⁸ （法）弗雷德里克·巴比耶（Frederic Barbier）著，劉陽等譯：《書籍的歷史》（Histoire DU Livre），第六章，4，閱讀，（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年 1 月），頁 132-133。

雕版印刷出現於中唐前後，懿宗咸通九年（868）王玠印造《金剛經》，晚唐五代雕印佛教經文、圖像、咒語，以及日曆、藥方、韻書，要皆不離宗教信仰與民生日用，無關於政教。自五代馮道雕印監本《九經》「各部隨帙刻印版，廣頒天下」，已有較明確之政教指向。毋丘裔刊刻《文選》、《初學記》、《白氏六帖》，鏤板圖書，只為遺送學者，有流布濟眾之意在。五代以來，經史雖迭有雕版，然並未普及；其他子書及文集雕印者，質量仍有限。宋太宗朝曾雕印《開寶大藏經》，其後真宗、仁宗亦熱中推廣雕板印刷，唯數量有限。流通之圖書，仍以傳鈔複製圖書為主。故蘇軾所見老儒先生，少時求《史記》、《漢書》，「皆手自書，日夜誦讀」。迨神宗熙寧、元豐間，雕版作為印刷傳媒，成為圖書複製之新寵，蘇軾所謂「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印本之快捷便利，寫本實難望其項背。又如邢昺、向敏中之言：

（真宗景德二年夏天，1005）上幸國子監閱書庫，問祭酒邢昺「書版幾何？」昺曰：「國初不及四千，今十餘萬，經史正義皆具。臣少時業儒，觀學徒能具經疏者百無一二，蓋傳寫不給。今板本大備，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時之幸也。」（南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六十，景德二年五月戊辰朔，頁1333）

（真宗皇帝）謂（向）敏中曰：「今學者易得書籍。」敏中曰：「國初惟張昭家有三史。太祖克定四方，太宗崇尚儒學，繼以陛下稽古好文，今三史、《三國志》、《晉書》皆鏤板，士大夫不勞力而家有舊典，此實千齡之盛也。」（同上，卷七十四，大中祥符三年十一月壬辰，頁1694）

《續資治通鑑長編》載邢昺（930-1010）答真宗問國子監雕版圖書，所謂「國初不及四千，今十餘萬，經史正義皆具」；「今板本大備，士庶家皆有之」。由此可見，不到二十年之內，國子監之雕版圖書增加了25倍，這成長的數目令人驚訝。向敏中答真宗：「今學者易得書籍」，亦稱：「今士大夫不勞力而家有舊典」。不假抄寫而有圖書；即中秘所藏，士庶家亦有其複本。雕版印刷如此普及、易得，故當時士人皆以為「千齡之盛」，為「儒者逢時之幸」，此蓋與寫本、抄本、藏本相較而言。至於東坡推論，印刷作為圖書傳媒，宋人之「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

自是一針見血之論。南宋以後，持續崇儒右文，家藏官藏之善本珍笈，往往鋟版流傳。王國維〈西湖書院書版考〉稱：宋亡元興，以杭州國子監為西湖書院，監中板庫度藏四部書板 20 餘萬片。至正二十一年（1361）十月至二十三年七月，重刻修補宋國子監書板，約近 120 種。⁹此單就官刻本國子監本而言，已如是之多元而繁盛，其他坊刻本、家刻本蓋亦競奇爭妍，不遑多讓，宋代可謂雕版印刷的黃金時代。¹⁰三百多年間，刻書之多、地域之廣、規模之大、版印之精、流通之寬，都堪稱前所未有，後世楷模，蔚然形成「印本文化」。¹¹覆按《宋會要輯稿》所云，可以窺其梗概：

紹興之初，已下借書分校之令，至十三年詔求遺書，十六年又定獻書推賞之格，圖籍於是備矣。然至今又四十年，承平滋久，四方之人益以典籍為重。凡搢紳家世所藏善本，監司郡守搜訪得之，往往鋟板以為官書，所在各自板行。（《宋會要輯稿》〈崇學四〉，孝宗淳熙十三年（1186）九月二十五日祕書郎莫叔光言）

凡亡闕之書，購求備至；每於藏書之家借本，必令置籍出納。傳寫既畢，隨便給還，靡有損失，故奇書祕籍，悉無隱焉。國學，館閣經史有未印版者，悉令刊刻。（《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之一四）

「凡搢紳家世所藏善本，往往鋟板以為官書，所在各自板行」；「國學，館閣經史有未印版者，悉令刊刻」，以雕版複製圖書，如此全面而一貫，自然促成印本繁榮，與寫本藏本競奇爭輝之盛況。宋代士人相較於唐代，圖書傳播、知識流通的媒介，多了一種印刷傳媒之選擇：價廉、悅目，與同起於北宋之活字版相當；所謂「若印數十百千本，則極為神速」。依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四〈經籍會通四〉之說，知識傳媒進入寫本時代，的確「楮墨之功簡約輕省，數倍前矣」；然「紬閱

⁹ 王國維：〈西湖書院書版考〉，陳袤〈西湖書院重整書目記〉，轉引自李瑞良編著：《中國出版編年史》上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頁383。

¹⁰ 張秀民《中國印刷史》（上），插圖珍藏增訂本，第一章、〈宋代雕版印刷的黃金時代〉，（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10），頁40-161。

¹¹ 李致忠：《古書版本學概論》，第四章〈印刷術的發明與發展〉，（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11月），頁50。

展舒甚為煩數，收集整比彌費辛勤」，仍有不便捷者在。迨五代宋初，「鈔錄一變而為印摹」，以印本替代寫本，始有「事什而功百」之效，才算真正的「簡約輕省」。要之，雕版印刷雖出現於八世紀，但大量用於刊印書籍，則始於北宋十世紀中葉以後；至於刊本書籍數量之激增和種類之豐富，則又在國子監刊書興盛的北宋之後。¹² 印本之為知識傳媒，相較於竹帛寫本，「不但什百而且千萬矣」，此誠宋代以後士人之厚幸也。所謂「千齡之盛」、「逢時之幸」，是頌詞，亦是實錄。

英國劍橋大學李約瑟博士《中國科學技術史》（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第五卷為《印刷術》，十分強調宋代的變革和飛躍的進步，以為都跟雕版印刷有關。曾云：「這些巨大的變化和進步，大概沒有一個不是和印刷術這一主要發明相聯繫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第六卷第三十八章，為〈植物學〉，其中論及宋元博物學（《本草》學）和雕版印刷之關係，極力贊揚印刷術對於圖書傳播的效應。如：

《太平聖惠方》，是一個欽定的醫學方劑寶庫（公元 992 年）。……在 1111 年，還刊印了宋代官修的醫學類書《聖濟總錄》，由朝廷內 12 位醫官組成的委員會編成。……

在其中，本草學家、植物學家、動物學家……，發現了自己的特長，並加以發揮。他們抓住了對植物和動物做木刻圖的大好機會，其作品難以置信地增多了；而在前二三十年甚至半個世紀，這個領域中幾乎沒有報導什麼新東西。而當時，在一年內就有好幾本關於博物學的書出版，這…是評論標準的提高，以及印刷術的發展，使得修訂版和再版都更加容易。……

公元 973 年，…劉翰…馬志…盧多遜被任命撰著一部藥典。在年底完成編寫，並刊印了《開寶新詳定本草》，這部藥典將代替以前所有的本草學專論，並借助印刷技術得以大量刊行。由於該書接著就受到一些批評，所以翌年（即公元 974 年），就迅速修訂，發行了第二版。這種情況，在印刷時代以前是辦不到的！¹³

¹² 宿白《唐宋時期的雕版印刷》，〈南宋刻本書的激增和刊書地點的擴展〉，（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3），頁 105。

¹³ 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六卷《生物學及其相關技術》，第三十八章〈植物學〉，d、文獻（2），

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之《印刷術》卷，十分推崇雕版印刷在宋代的崛起和推廣，以為一切「巨大的變化和進步都跟印刷術相聯繫」；這跟後來谷登堡發明活字版印刷術，在中古歐洲造成相當鉅大而深遠的影響，號稱「變革的推手」；宗教革命、文藝復興，都因活字印刷而推波助瀾，催化成功。¹⁴《中國科學技術史》第六卷第三十八章〈植物學〉，上述引文談到本草學家、博物學家整理、編纂、校定、刊行醫學類書及本草藥典的情況。李約瑟博士不斷強調下列觀點：作品數量所以不斷增多，評論標準所以不斷提高，迅速修訂、廣泛傳播之所以成為可能，修訂版和再版所以更加容易，都得歸功於印刷術的發展，「這種情況在印刷時代以前是辦不到的！」就上述本草藥典在宋代的刊行傳播為例，雕版印刷確實成為「變革的推手」；至於在其他門類生發之效應，亦同理可證，可以類推。日本漢學家吉川幸次郎於 1970 年代，討論宋人的歷史意識，花了七分之二篇幅，述說宋代校定印刷正史及《資治通鑑》的影響，更強調印刷術出現之後，書籍購求容易，促成傳播便捷，圓滿流布，於是形成以資鑑為主之歷史意識。¹⁵宋代子部與史部書籍之傳播，得力於雕版印刷之應用與推廣；其他經部、集部書籍之流通，乃至學以致用，大抵亦應如是，不可能有例外。

論者稱：「宋三百年間，鋟板成市，板本布滿於天下。而中秘所儲，莫不家藏而人有。無漢以前耳受之艱，無唐以前手抄之勤。讀書者事半而功倍，何其幸也。」金鏢〈漢唐以來書籍制度考〉亦云：「至板本盛行，摹印極便，聖經賢傳乃得家傳而人誦，固亦有功名教矣！」¹⁶印本使用之便利，傳播之快捷，知識流通之迅速，無論聖經賢傳，子史文集，多因此而容易「家傳而人誦」，既有功於名教，自影響

VI 宋朝、元朝和明朝（公元 10-16 世紀）的博物學和印刷業，（北京：科學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 8 月），頁 237-239。

¹⁴ 費夫賀、馬爾坦著，李鴻志譯：《印刷書的誕生》（*The Coming of the Book*），一、從手抄本到印刷書，（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 年 12 月），頁 248-338。

¹⁵ 吉川幸次郎：〈宋人の歴史意識——「資治通鑑」の意義〉，《東洋史研究》第二十四卷第四號，日本昭和四十一年（1966 年）3 月，頁 1-15。

¹⁶ 《宋會要輯稿·崇儒四》引《孝宗會要》淳熙十三年丙午，（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1 年 9 月），頁 259。章權才：《宋明經學史》，第二章第二節〈鑄版印刷的發明與經籍的廣泛傳播〉，引吳澂說，（韶關：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 年 9 月），頁 58。金鏢：《求古錄禮說》，袁詠秋等：《中國歷代國家藏書機構及名家藏讀敘傳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 年 12 月），頁 178。

宋代之學風與士習。稿本、寫本、藏本既不可能皆付雕版，於是取捨予奪、輕重緩急之間，即存在品味與接受，其中關係學風士習之反饋與市場消費的導向。書籍之雕版，首在滿足最大的市場需求；書商出版的主要考量，既然在獲利與暢銷，於是當時最感興趣的著作，優先列入考慮。因此，從印刷文化史之視角，考察宋代整理雕印前代或當代四部典籍之情況，即可窺見兩宋文風士習之嬗變，以及審美品味之移換。

依據《宋史藝文志》統計：宋初開國，圖書才萬餘卷；仁宗慶曆十一年（1041）纂修《崇文總目》，已著錄藏書三〇六六九卷；終北宋之世，圖書目錄，凡六七〇五部，七三八七七卷。南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編次《中興館閣書目》，著錄藏書四四四八六卷；寧宗嘉定十三年（1220），編修《中興館閣續書目》，再著錄一四九四三卷。《宋史·藝文志》所著錄四部典籍，共九千八百十九部，十一萬九千九百七十二卷。以宋代目錄專籍而言，尤袤《遂初堂書目》著錄私家藏書版本，多達 3000 餘種。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著錄 1492 部，24500 卷。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著錄圖書 3096 種，51180 卷。圖書質量倍數成長，其中自有印本之書在。宋代刻書業興盛，不僅前人著作陸續開雕傳世，以供研讀借鏡；即當代作品亦多印刷成書，因得流傳後世。宋代之版刻，對於書籍之流布，知識之傳播，貢獻極大。王世貞《朝野異聞錄》載：明權相嚴嵩被抄家時，發現家藏宋版書 6853 部，可見明代宋版書流傳之一斑。宋版書存世於今者，日本阿部一郎教授考察，全世界約有 2120 種，凡 3230 部以上。由宋代之藏書目錄，明代宋版書之流傳，以及當代海內外宋版書之著錄，可以推想宋代圖書流傳之盛況¹⁷。

二、宋代雕版印刷之效益及其政教目的與使命

¹⁷ 楊渭生等：《兩宋文化史研究》，第十一章〈宋代的刻書與藏書〉，二、版本的流傳，（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8 年 12 月），頁 485-487。陳堅、馬文大：《宋元版刻圖釋》，〈宋代版刻述略〉，（北京：學苑出版社，2000 年），頁 21。

北宋朝廷雖提倡雕版圖書，上至國子監，下至州縣多有官刻本，其他又有坊刻本，家刻本之目；然手稿本、傳抄本，皆是寫本，仍佔大多數。南宋尤袤《遂初堂書目》首開著錄版本之始，然所著錄以抄本為主，刻本書數量尙未超過寫本。下至趙希弁《郡齋讀書志·附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二書著錄，刻本書始超越寫本書，成爲圖書市場之主流。至度宗咸淳間（1265-1274），廖瑩中世綵堂校刻《九經》，取校 23 種版本，清一色爲刻本，無一寫本。¹⁸寫本與印本之消長，由此可見一斑。

印本繁榮之時，寫本所以仍並存不廢，其主要來源大抵有四：或以抄書爲讀書，或爲求書而謄錄，或爲著書而手寫，或爲編書而傳抄。其他，如歷朝皇帝實錄、會要，及民間族譜、家譜、年譜等，要皆寫本未刊。讀書、求書、著書、編書者既多，無論官府或私家，寫本、抄本遂豐富多元，興盛不衰。¹⁹朝廷既實施右文，於是撰述繁多，琳瑯滿目之撰著，不可能立即刊行，也不可能都交付雕印。書稿或抄本若無印本流傳，當然得「全仗抄本延其命脈」，「抄本之不可廢，其理甚爲明白」²⁰。印刷傳媒之繁榮昌盛，與寫本競妍爭勝，作爲知識傳播之媒介，贏得更多之信賴與喜愛。然東晉六朝以來，寫本藏本之流通傳播，仍並存不廢。據《續資治通鑑長編》、《宋會要輯稿》、《麟臺故事》記載：宋代秘閣三館所藏，除印本外，「借本繕寫」之孤本善本尤多；民間藏書家，亦多手自傳鈔校讎，往往有善本完本。要之，北宋之圖書流通，與知識傳播，關鍵在印本之崛起風行，作爲知識傳媒，印本與藏本寫本相輔相成，相互爭輝，相得益彰。

無論創作、論述，或編纂類書、叢書、總集、別集，最初書稿，必定爲寫本。寫本、鈔本、藏本若經雕版刊行流通，則成印本、刊本。官府私家藏書，則寫本印本兼收並蓄。由於雕版圖書之崛起與繁榮，配合科舉考試之實施，宋代藏書事業盛況空前。無論官府藏書、私家藏書、書院藏書、寺觀藏書，質量均十分可觀。舉凡

¹⁸ 王重民《中國目錄學史》第三章第五節，（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 120。

¹⁹ 李瑞良：《中國古代圖書流通史》，第五章，四、〈宋元寫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 5 月），頁 267-270。

²⁰ 張舜徽：《中國古書版本研究》，〈抄本〉，（台北：民主出版社），頁 73-81。

藏書的品種數量，或藏書之內容、藏書之方式方法、藏書之利用、藏書之思想、理論，宋代皆超越前代。朝廷有三館秘閣，「掌凡邦國經籍圖書」之編纂、典藏、校勘、出版；各路州縣，官府或私人，亦有館藏圖書，可資借閱。宋代私家藏書可考者，約在 400 名以上；兩宋書院，近 400 餘所，亦皆有其藏書。佛寺道觀，屢印《藏經》、《道藏》，亦藏書豐富。²¹宋代四大藏書系統，蔚為輝煌之藏書文化，對於圖書傳播、閱讀接受、思維創發、論著方式、學風趨向，多有激盪與影響。

相較於漢魏六朝、初、盛、中、晚唐，宋代之圖書傳媒，有來自讀書、求書、著書、編書、校書之傳抄本、書稿本；更有來自「易成、難毀、節費、便藏」，化身千萬，無遠弗屆之印刷傳媒。孔恩（Thomas Kuhn）在《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一書中，將典範轉移成新心智模式之經過，形容成單向，以為是絕對無法回頭之過程。溫德（Jerry Wind）、庫魯克（Colin Crook）《超凡的思維力量》（*The Power of Impossible Thinking*）不以為然，強調典範轉移，是一條雙向道，「新舊典範是並存的」，「我們可在新舊之間，選擇要前進或退後」。作者列舉網際網路、無紙張辦公室、電視、指針與數字、航空、通風系統、管理趨勢、醫學等等。²²同理可證，印刷傳媒之為圖書傳播，其興起、發展、繁榮之同時，傳統之寫本圖書仍然並存不廢。印本圖書之為傳媒新寵，只是在寫本之外，士人購書增添另類之選擇而已，新舊典範之選擇，是雙向道，並存而不偏廢的。不過，印本之為圖書傳媒，其生發之效應，較諸楮墨簡帛，「不但什百而且千萬矣」。明胡應麟述說歷代書籍流變，於此論之極詳，其言曰：

今人事事不如古，固也；亦有事什而功百者，書籍是也。三代漆文竹簡冗重艱難，不可名狀；秦漢以還浸知鈔錄，楮墨之功簡約輕省，數倍前矣。然自漢至唐猶用卷軸，卷必重裝，一紙表裏，常兼數番，且每讀一卷或每檢一事，紬閱展舒甚為煩數，收集整比彌費辛勤。至唐末宋初，鈔錄一變而為印摹，卷軸一變而為書冊，易成、難毀、節費、便藏，四善具焉。邈而上之，至於

²¹ 徐凌志：《中國歷代藏書史》，第四章〈宋遼金時期藏書〉，（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頁134-218。

²² 溫德、庫魯克《超凡的思維力量》第四章〈典範轉移是一條雙向道〉，（臺北：台灣培生教育出版公司，2005.6），頁124-134。

漆書竹簡，不但什百而且千萬矣。士生三代後，此類未為不厚幸也。（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四，〈經籍會通四〉）

六朝至晚唐五代，複製圖書必須躬自抄錄，或倩人假手，既耗時費財，又緩不濟急。就閱讀而言，「紬閱展舒甚為煩數，收集整比彌費辛勤」，亦存在若干不便。到宋代雕版印刷時代，「鈔錄一變而為印摹，卷軸一變而為書冊」，印本圖書具備「易成、難毀、節費、便藏」四善，因此急速成為圖書傳媒之新寵。就知識傳播而言，無論傳統之寫本，或新興之印本，經官府、私家、書院、寺觀庋藏，既方便借閱利用，更達到保存、流通、傳播之效應。依加拿大傳播學家 M·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 1911-1980）「媒介即訊息」（the Media the Message）之提示，「媒介不僅是社會發展的基本動力，而且是區別人類社會不同形態的基本標誌」；因此，將西方近代史解釋為「建基于印刷文字的傳播上的偏頗，與知識上的壟斷的歷史」，²³從印刷文字作為傳播媒介視角，解讀西方近代之歷史，確有其道理。

所謂「傳播」（communication），指一種信息或知識的雙向互動交流過程。信息（information），指在特定時間、特定狀態下，對特定人提供的有用的知識。這「信息」概念，一旦被接受，經過消化理解，就成了知識。知識信息透過媒介傳播，形成傳播行為。論者稱：傳播行為大致可分信息傳達、信息接受、信息反饋三個面向；而信息反饋又分正反饋與負反饋，²⁴各有其傳播之歷程。傳播學功能學派，探討傳播現象的規律。1948年，美國政治學家拉斯威爾（Harold Lasswell, 1902-1978）曾提出五 W 模式，即 Who, Say what, In which channel, To whom, With what effect。將人類的傳播行為，表述為由五個要素構成，此即所謂五大基本傳播模式，如圖所示：

誰？（傳播者、控制研究）→說什麼？（訊息、內容分析）→透過什麼渠道？
（媒介、媒介分析）→向誰？（接受者、受眾分析）→產生什麼樣的效果？

²³ 董天策：《傳播學導論》，第四章第二節〈媒介的性質〉，二、媒介即訊息，引 Marshall McLuhan《人的延伸——媒介通論》（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4年1月），頁70-71。

²⁴ 同上註，第五章第一節〈傳播行為〉，頁76-84。

（效果、效果分析）

其後，1958年布萊道（Braddock），將上述傳播模式稍加改進，增加兩個 w，即“in what situation”，“for what purpose”，而成 7w，強調訊息在何種狀況下被傳播出去，以及傳播者的目的，而成爲如下之模式：²⁵

誰？（傳播者）→說什麼？（訊息）→透過什麼媒介？（媒介）→向誰？（接受者）→在什麼情況下？為什麼目的？產生什麼效果？（效果）

今試參考拉斯威爾（Lasswell）和布萊道（Braddock）二家之傳播模式，借鏡經驗學派之傳播學理論，²⁶以之詮釋解讀宋代之圖書流通，及印本與寫本圖書之爲傳媒，究竟生發何種效應？其中，特別借鏡經驗學派有關傳媒控制與傳媒效果之理論，以探討宋代雕版印刷之政教指向。印刷圖書作爲傳播媒介，朝廷、州縣、家族、書坊之雕印圖書，爲信息之傳達者；天下士子、生員、騷人、墨客、學者、方家爲信息之接受者。信息之傳達與接受間，生發正反饋與負反饋之效應，是所謂傳播效果。傳播效果（Communication Effects）研究傳播對社會、文化、群體或個人之影響。其中有所謂「適度效果模式」（Moderate Effects Model），可移以詮釋印刷傳媒之傳播效應。適度效果論，注重傳播效果長期、多種，而變量之作用，主要包括議程設置論、使用與滿足論，創新與擴散論、文化規範論等。維納的控制論（Wiener's Cybernetics），亦影響傳播學，有關制度、規範、管理、受眾與傳播效果等，多受控制論啓示。尤其是反饋（Feedback）的概念，對於討論傳播過程之雙向性和互動性，具有重大意義。²⁷

衡諸印刷傳媒與寫本藏本圖書引發豐富而多元之傳播訊息，將可能促進宋代社會發展之動力，形成宋型文化與唐型文化之不同。蘇軾〈李氏山房藏書記〉稱：「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清翁方綱《石洲詩話》卷

²⁵ 丹尼斯·麥魁爾（Denis Mc Quail）和史文·溫達爾（Sven Windahl）合著《傳播模式》*Communication Models for the Study of Mass Communications*，楊志弘、莫季雍譯本，（臺北：正中書局，1996，二版），頁 16-17。

²⁶ 參考同註 2，〈經驗學派〉，頁 58-99。

²⁷ 同上註，〈適度效果模式〉、維納的《控制論》，頁 70-74、頁 95-97。

四謂：「宋人之學，全在研理日精，觀書日富，因而論事日密」；錢存訓亦斷言：印刷術的發明和應用，在中國和西方一樣，「對學術風尚和社會發展，可能都產生一定的作用」；印刷術的普遍運用，被認為是「宋代經典研究的復興，及改變學術和著述風尚的一種原因」。²⁸李弘祺研究宋代教育，亦強調雕版印書之重大影響：「雕版印書對於大規模散播書籍，提供了經濟上的可行性（案：商品經濟，有利可圖），宋代因此從雕版印刷的發明中獲益良多。印刷術極為便利與經濟，它標誌著中國歷史上重要轉折點的出現」；²⁹其中或暗示：雕版印書對唐宋變革具有催化作用。循此以推，雕版圖書作為知識傳媒，對於日本京都學派所指唐宋變革之內涵，如政治、科舉、黨爭、平民、經濟、學術、文藝、法律諸要項，豈無激盪？豈無影響？筆者以為，考察印刷傳媒之發用，有助於詮釋解讀唐宋變革、唐型文化與宋型文化，以及詩分唐宋。

歷代王朝，為統一政治，昌明教化，無不提出一套政教指標，作為施政之參考方向；一言以蔽之，曰文以載道。漢孔安國〈尚書序〉所謂「恢弘至道，示以軌範」，足以垂世立教。唐代古文家更提倡文以明道，柳冕稱：「文章本以教化，形於治亂」；韓愈謂：「學所以為道，文所以為理」；柳宗元亦以為：「辭之傳於世者，必由于書。道假辭而明，辭假書而傳」。³⁰文章攸關教化與治亂，而政教之昌明期待文章與書籍，此理至明。

於是宋朝太祖、太宗以來，遵行「文以守成」之古訓，提倡右文崇儒，興教立學，培育才俊；科舉取士，優禮文人。宋太宗喜愛讀書，特別留心「諸故事可資風教者」，期許「文德致治」。真宗、仁宗皇帝曾下詔勸學，真宗皇帝〈勸學文〉稱：「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鐘粟。安居不用架高堂，書中自有黃金屋。出門莫恨無人隨，書中車馬多如簇。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自有顏如玉。男兒欲遂平生志，

²⁸ 錢存訓：《中國紙和印刷文化史》，第十章（四）印刷術在中國社會和學術上的功能，（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5月），頁356。

²⁹ 李弘祺：《宋代官學教育與科舉》，第二章第五節〈印刷術的廣泛應用及大眾教育的發展〉，（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4年2月），頁30。

³⁰ 羅宗強《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第六章第三節〈韓愈、柳宗元的文體和文風改革與理論上的建樹〉，（北京：中華書局，1999.8），頁202-235。

六經勤向窗前讀。」仁宗皇帝亦有〈勸學詩〉謂「朕觀無學人，無物堪比倫。若比于草木，草有靈芝木有椿。若比于禽獸，禽有鸞鳳獸有麟。若比于糞土，糞滋五穀土養民。世間無限物，無比無學人。」³¹真宗皇帝更御撰〈崇儒術論〉，深信「儒術汙隆，其應實大。命歷迭改，而風教一揆」，可見文以載道，政教合一之重要。於是上行下效，《宋史·文苑傳序》所謂：「海內文士彬彬輩出」，足見其效益。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於是文治蒸蒸，號稱造極。南宋高宗曾申明祖宗遺訓，所謂「崇儒尚文，治世急務」。³²具體政策則落實於科舉考試，推廣於雕版印刷。在雕版印刷崛起，與傳統之寫本競奇爭妍，逐漸成爲圖書信息傳播之新寵與主流之際，宋代朝廷一方面標榜右文崇儒，推廣雕版印書；一方面又要求文以載道與政教合一，對於忌諱異端之印本實施「看詳禁燬」，一縱一擒，或放或收，總以「文以載道」爲依歸。學界論宋學之發展，談及儒學復興，「文以明道」是此中一大課題。³³兩宋朝廷對印刷傳媒之管理，採取既鼓勵又監控之雙重手段，此勢所必至，理有固然。

傳播學除控制研究外，有關傳播效果之研究，一直也是傳播學之核心課題。雕版圖書作爲知識傳播之媒介，無論與寫本藏本競妍爭輝，或壓勝藏本寫本而獨領風騷，都與傳播之目的與效果息息相關。就朝廷監本圖書之雕印傳播言，目的在「宣索賜予，興教濟眾」；而家刻本、坊刻本之雕印傳播，在「布之四方，圖永其傳」，朝野於印本圖書之傳播，與傳播學經驗學派論傳媒影響，有所謂「議程（題）設置模式」（The Agenda-Setting Model），³⁴可以相互發明。就教育文化言，圖書付諸雕印，主要期待「資鑑與致用，度人以金針」，由於受眾已有預設意識，取捨圖書往往即是立場心態之反應。因此，典範作家如杜甫、韓愈、蘇軾、黃庭堅遂成意見領袖，唯他馬首是瞻，於是強勢主導下，印刷傳媒之效果皆極強極佳，傳播之信息

³¹ 宋黃堅《古文真寶》，朝鮮隆慶元年（1567）銅活字「詳說大全」本，熊禮匯點校，卷之一前集，〈真宗皇帝勸學〉、〈仁宗皇帝勸學〉，（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7），頁14。

³² 《宋會要輯稿·崇儒四》，太宗太平興國九年（984）正月；高宗紹興十四年（1144）七月二十九日，頁234，頁252。

³³ 張毅《儒家文藝美學——從原始儒家到現代新儒家》，第三章〈文以明道和儒學復興〉，（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4.4），頁149-210。

³⁴ 常昌富、李依倩編選，關世杰等譯，《大眾傳播學：影響研究範式》，〈議程設置〉，（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10），頁65-132。

流將是一級的。否則，信息流向一般受眾，生發之「影響流」將是多級不一的。當然朝廷監控圖書實施看詳禁燬，實則禁不勝禁，自是傳播控制之常規與常態。

圖書作為知識之傳媒，對於社會之發展，文明之演進，貢獻既深且遠。《淮南子·本經訓》載：倉頡發明文字，「天雨粟，鬼夜哭」，何況知識之流通，由甲骨鍾鼎，而竹簡、帛書，再由竹簡、帛書，演進為寫本、鈔本？至趙宋一朝，實施右文，於寫本、藏本外，圖書複製之技術、知識傳播之渠道，又增多一雕版印刷之化身千萬，無遠弗屆。印本崛起繁榮，與寫本爭輝爭勝，終而取代寫本，成為圖書傳播之主流，對於教育、科學、學術、藝文、思潮、風尚諸方面之激盪，主體影響如何？個別效應又如何？學界於上述之整合研究，探論不多，成果十分有限。筆者嘗試梳理印刷史料、版本著錄，取證傳世文獻，分為二大方面論述：其一，崇儒右文，推廣雕版；其二，圖書監控，看詳禁毀，一放一收，如物理學上之離心力和向心力，以見印刷傳媒之接受與推廣，自有其目的性與使命感。雕版圖書作為印刷傳媒，大抵有四大層面之目的和使命：其一，在朝廷，監本官刻本之使命，在「宣索賜予，興教濟眾」；其二，家刻本、坊刻本，期盼「布之四方，圖永其傳」；其三，就教育文化而言，雕版圖書更以「資鑑與致用，度人以金針」自許；其四，就中央集權，統一政教而言，對於書坊刊本，嚴格進行監控，實施看詳禁毀。分別論述如下：

（一）宣索賜予，興教濟眾

宋初開國以來，太宗曾謂侍臣曰：「夫教化之本，治亂之原，苟非書籍，何以取法？」於是崇儒右文成為祖宗家法。真宗、仁宗，多極力推廣雕版印刷，國子監雕版經史圖書，甚至發揮平抑書價之功能。雕版印刷之繁榮，與宋朝崇儒右文政策相切合，國子監負責雕印經史群籍，主要在「以備朝廷宣索賜予之用」，至於「出鬻而收其直」，也是為了書籍流通傳播，下列文獻所言，可見雕版印刷之使命與目的：

淳化五年……（國子監）始置書庫監官，以京朝官充，掌印經史群書，以備朝廷宣索賜予之用，及出鬻而收其直，以上于官。（《宋史》卷一六五，〈職官五〉）

曩以群書，鏤于方版，冀傳函夏，用廣師儒。期于向方，固靡言利。將使庠序之下，日集于青襟；區域之中，咸勤于素業。敦本抑末，不其盛歟！其國子監經書更不增價。（宋真宗四四，〈國子監經書更不增價詔〉，《宋大詔令集》卷一五〇，天禧元年九月癸亥；《全宋文》第六冊，卷二五五，頁714）

右臣伏見國子監所賣書，向用越紙而價小。今用襄紙而價高。紙既不迨，而價增於舊，甚非聖朝章明古訓以教後學之意。臣愚欲乞計工紙之費，以為之價。務廣其傳，不求利，亦聖教之一助。伏候敕旨。（陳師道《後山居士文集》卷十一，〈論國子賣書狀〉）

陳師道奏議，建請國子監所賣書「乞計工紙之費，以為之價。務廣其傳，不求利」；如此，將是「聖教之一助」。宋真宗推想雕版印刷之繁榮，有助於讀書治學，所謂「將使庠序之下，日集于青襟；區域之中，咸勤于素業」，群書鏤版，「冀傳函夏，用廣師儒」，正是聖意與政策，符合其〈勸學文〉之目的。在「敦本抑末」、「固靡言利」的政令指示下，監本經書更不增價。同時接受臣僚建言，「就三館雕造」，期望「大段流布」，於是善本經史，甚至子集，多交付國子監校勘、刻板、刊行。如云：

五臣注《文選》，傳行已久。竊見李善《文選》援引該贍，典故分明，若許雕印，必大段流布。欲乞更差國子監說書官員校定淨本，後抄寫板本，更切對讀後，就三館雕造。後勅旨。奉勅宜依所奏施行。（李善《文選》國子監准勅節文，王國維《五代兩宋監本考》引）

翰林學士李淑言：「竊見近日發解進士，多取別書、小說、古人文集，或移合經注以為題目，競務新奧。朝廷從學取士，本欲興從風教，反使後進習尚異端，非所謂化成之義也。……其經典子書之內，有《國語》、《荀子》、《文中子》，儒學所崇，與六經通貫。先朝以來，嘗於此出題，只是國序未有印本。欲望取上件三書差官校刻、刻板，撰定《音義》，付國子監施行。」詔可。（《宋會要輯稿》，〈崇儒四〉，仁宗景祐四年（丁丑，1037年）十月）

（大觀二年，1108）八月二十七日上批：國子監印造監本書籍，差舛頗多，兼版缺之處，筆吏書填不成文理。頒行州縣，錫賜外夷，訛謬何以垂示？仰

大司成專一管勾，分委國子監、太學、辟雍官屬正、錄、博士、書庫官，分定工程，責以歲月，刪改校正，疾速別補。內大段損缺者，重別雕造，仍于每集版末注入今來校勘官職位、姓名。候一切了畢，印造一監，令尚書禮部覆行抽搞，總檢有無差舛，保明聞奏。今後新行書籍，仰強淵明，不得奏乞差官置局。今貽改《毛詩》一冊降出。（《宋會要輯稿·職官》二八之一八）

李淑奏請刻版刊行經典子書，主要爲了崇揚儒學，興從風教。從徽宗御批，可知國子監印造書籍之使命，主要在「頒行州縣，錫賜外夷」。北宋開國以來，極注重醫學，朝廷中央設有太醫署、太醫局、翰林醫官院、御藥院、翰林醫官局、賣藥所、合藥所等醫藥衛生機構。³⁵三館秘閣更系統整理校正醫藥方劑之書，交付國子監雕版，³⁶以便利用厚生，如：

恭惟主上以至仁厚德，函養生類，一物失所則為之惻然。且謂札瘥至苻臻四時代有救恤之患，無先醫術。蚤歲屢勅近臣讎校《歧黃內經》，重定《針艾俞穴》，或範金揭石，或鏤版聯編。憫南方蠱惑之妖，於是作《慶曆善救方》以賜之。思下民資用之闕，於是作《簡要濟眾方》以示之。今復廣藥譜之備，圖地產之所宜，物色萬殊，指掌斯見。將使合和者得十全之效，飲餌者無未達之疑。納斯民於壽康，召和氣於穹壤，太平之致，茲有助焉。（嘉祐六年朝奉郎太常博士……蘇頌《嘉祐補注本草圖經·序》）

哲宗時，臣察言：「竊見高麗獻到書，內有《黃帝鍼經》九卷。……此書久經兵火，亡失幾盡，偶存於東夷。今此來獻，篇秩具存，不可不宣布海內，使學者誦習。伏望朝廷詳酌，下尚書工部，雕刻印板，送國子監依例摹印施行。所貴濟眾之功，溥及天下。」有旨：……依所申施行。（江少虞《皇宋事實類苑》卷三十一，〈詞翰書籍二十〉）

哲宗時高麗獻《黃帝鍼經》佚書，旨下尚書工部，雕刻印板，目的在「濟眾之功，溥及天下」。蘇頌序《本草圖經》監本，頌揚仁宗「至仁厚德，函養生類」，讎校刊定醫書，編纂勅作《善救方》、《濟眾方》，今又「廣藥譜之備，圖地產之

³⁵ 郭聲波：《宋朝官方文化機構研究》，第三章第二節〈醫藥衛生機構〉，（成都：天地出版社，2000.6），頁 72-86。

³⁶ 王國維：〈五代兩宋監本考〉，宋原放、王有朋輯注《中國出版史料》（古代部分）第一卷，（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10月），頁 267-286。

所宜」，而編訂補注《嘉祐本草圖經》，在醫藥方面的貢獻，期望使「合和者得十全之效，飲餌者無未達之疑」；目的在「納斯民於壽康，召和氣於穹壤」，朝廷博施濟眾之意，相當明確。

北宋歷朝皇帝，除有政策指示勸學、興教、崇儒、右文外，又得雕版印刷之輔助，堪稱功德圓滿。國子監雕印圖書，特別關注經籍史書之校讎補正，鏤版頒行，如下列文獻所示：

淳化五年（994）兼判國子監。至上言：「《五經》書疏已板行，惟《二傳》、《二禮》、《孝經》、《論語》、《爾雅》七經疏未備，豈副仁君垂訓之意？今直講崔頤正、孫奭、崔偓佺等皆勵精強學，博通經義，望令重加讎校，以備刊刻。」從之。後又引吳淑、舒雅、杜鎬檢正譌謬，至與李沆總領而裁處之。（《宋史》卷二百六十六，〈李至傳〉）

監本書籍者，紹興末年所刊也。國家艱難以來，固未暇及。九年九月，張彥實待制為尚書郎，始請下諸道州學，取舊監本書籍，鏤版頒行。從之。然所取諸書多殘缺，故胄監刊《六經》無《禮記》，正史無《漢》、《唐》。二十一年五月，輔臣復以為言，上謂秦益公曰：「監中其它闕書，亦令次第鏤板，雖重有所費，蓋不惜也。」繇是經籍復全。先是，王瞻叔為學官，嘗請摹印諸經義疏及經典釋文，許郡縣以贍學或係省錢各市一本，置之於學。上許之。今士大夫仕於朝者，率費紙墨錢千餘緡，而得書於監云。（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四，〈監本書籍〉）

（《說文解字》）歷代傳寫，偽謬實多，六書之踪，無所法取；若不重加刊正，漸恐失其源流。爰命儒學之臣，其詳篆籀之迹。……商榷是非，補正闕漏……用廣流布。（雍熙三年（986）御批雕印《說文解字》，葉德輝《書林清話》卷二引）

初詔校《晉書》，或謂兩晉事多鄙惡不可流行者。帝以語宰臣，畢士安對曰：「惡以戒世，善以勸後，善惡之事，《春秋》備載！」帝然之，故命刊刻。（《宋會要輯稿》，〈崇儒四〉，真宗咸平三年（庚子，西元 1000 年）十月）

參知政事龔茂良言：「嚴州近刊《資治通鑑紀事》一書，乃袁樞所編。其書

有補治道，或取以賜東宮，增益見聞。」詔本州印十部，仍以卿本先次來上。
（《宋會要輯稿》，〈崇儒四〉，孝宗淳熙三年（丙申，1176年）五月）

李至上奏，關切「《五經》書疏已板行」，「《七經》疏義未審」，以為未「副仁君垂訓之意」；「望令重加讎校，以備刊刻」。徽欽之難以來，監本書籍多殘缺，高宗諭令：「監中其它闕書，亦令次第鏤板，雖重有所費，蓋不惜也」，因而「經籍復全」，朝廷注重圖書文獻之徵存保全如此。其他，如關心《說文解字》字書之譌謬闕漏，藉重新雕印，藉機可以「商榷是非，補正闕漏」，「用廣流布」。詔校刊刻《晉書》，目的在「戒世勸後」；詔印《資治通鑑紀事》，目的在「有補治道」、「增益見聞」。朝廷刊刻經史之用心，於此可見一斑。

國子監雕印圖書，經史類最稱大宗，醫書、諸子，以及總集類圖書，亦多經細心校補，然後雕版刊行，亦各有其雕印之目的與使命，如下列文獻所云：

大凡醫書之行於世者，皆仁廟朝所校定也。案《會要》：嘉祐二年，置校正醫書局於編修院……每一書畢即奉上，億等皆為之序，下國子監板行。並補注《本草》、修《圖經》、《千金翼方》、《金匱要略》、《傷寒論》，悉從摹印，天下皆知學古方書。嗚呼！聖朝仁民之意溥矣。（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十三，《外臺秘要方》四十卷按語）

今有《千金翼方》、《金匱要略方》、《王氏脈經》、《補注本草》、《圖經本草》等五件醫書，日用而不可缺。本監雖見印賣，皆是中字，醫人往往無錢請買，兼外州軍尤不可得。欲乞開作小字，重行校對出賣，及降外州軍施行。（同上，《脈經》十卷，〈國子監准監關准尚書禮部符〉）

國子監直講孫奭言：「……今諸經及《老子釋文》共二十七卷，並已雕印頒行，唯闕《莊子釋文》三卷，欲望雕印，冀備一家之學。又《莊子》注本前後甚多，……唯郭象所注特會莊生之旨，亦請依《道德經》例，差官校定刊印。」（《宋會要輯稿》，〈崇儒四〉，真宗景德二年（甲辰，1005年）二月）

詔國子監校勘《孟子》，（龍圖閣待制吳）奭等言：「《孟子》舊有張鎰、丁安著二家撰錄，文理舛互。今采眾家之善，削去異端，仍依《經典釋文》刊《音義》二卷。是年四月以進。詔兩制與丁謂看詳，乞送本監鏤板。」（《宋

會要輯稿》，〈崇儒四〉，真宗大中祥符四年（辛亥，1011年）十月）

太宗皇帝始則編小說而成《廣記》，纂百氏而著《御覽》，集章句而製《文苑》，聚方書而撰《神醫》。次復刊廣疏于九經，較闕疑于三史，修古學于篆籀，總妙言于釋老，洪猷丕顯，能事畢陳。朕適遵先志，肇振斯文，載命群儒，共司綴緝。……凡一千卷。（《玉海》卷五四，《全宋文》卷二六二，宋真宗《冊府元龜·序》）

仁宗朝國子監所校定板行醫書，如《本草圖經》、《千金翼方》、《金匱要略》之倫，皆「日用而不可缺」，由於「醫人往往無錢請買」，所以「悉從摹印」，「重行校對出賣」。其目的在博愛仁民，希望「天下皆知學古方書」。諸子之學，如《老子》、《莊子》、《孟子》等，無論原典或釋文，多「采眾家之善，削去異端」，「差官校定刊印」，「送本監鏤板」，目的在「冀備一家之學」。至於太宗皇帝以來，纂集《太平廣記》、《文苑英華》、《神醫普救方》，以及《太平御覽》、《冊府元龜》等篇幅重大之高文典冊，繼志述事、蕭規曹隨，一切有關雕印群籍之「洪猷能事」，多以「適遵先志，肇振斯文」為依歸，為神聖使命。雕版印刷有如是之目的與使命，方能有如是之繁榮與昌盛。

國子監所雕經史圖書，往往頒賜太學、郡縣學、書院，以及域外友邦。《宋史·職官志五》稱：國子監「置書庫監官，以京朝官充，掌印經史群書，以備朝廷宣索賜予之用」，從可見雕版印刷之使命，朝廷「冀傳華夷，興教濟眾」之政策。

（二）布之四方，圖永其傳

國子監雕印經、史、子、集四部要籍，有其政策性之功能與使命，一語以蔽之，曰「冀傳華夷，興教濟眾」。至於一般州郡府學雕印，書院書齋家刻本，以及杭州、成都、建寧、江南等四大刻書中心之書坊刻本，其目的較功利與務實，大抵不出「布之四方，圖永其傳」二語，如下列文獻所示：

元質頃游三館，蒐覽載籍，得《兩漢博聞》一書。記事纂言，真得提鉤之□，□其傳之不廣也。爰是正而芟約之。刻板□□熟郡齋。（胡元質乾道壬辰（八年）姑熟郡齋刻本《兩漢博聞》，林申清《宋元書刻牌記圖錄》圖十六）

先於淳熙四年十一月內承尚書省劄子，勘會已降指揮，令臨安府校正開雕《聖宋文海》。十一月九日，三省同奉聖旨，委呂祖謙專一精加校證。祖謙竊見《文海》元係書坊一時刊行，去取未精，名賢高文大冊尚多遺落，遂具劄子乞一就增損，仍斷自中興以前銓次，庶幾可以行遠。十一月五日，三省同奉聖旨：依。祖謙尋將祕書省集庫所藏本朝諸家文集及於士大夫家宛轉假借，旁采傳記，它書雖不知名氏，擇其文可錄者，用《文選·古詩十九首》例，並行編纂。（呂祖謙《繳進文鑑劄子》，《聖宋文海》周必大改名為《皇朝文鑑》）

此書浙間所刊，止前錄四卷，學士大夫恨不得見全書。今得王知府宅真本全帙四錄，條章無遺，誠冠世之異書也。敬三復校正，鋟木以行其傳，覽者幸鑒。（建陽龍山書院刻王明清《揮塵錄》，同上，圖三十七）

饒州德興縣莊谿書癡子董應夢重行校證，寫作大字，命工刊板，衡用皮紙印造，務在流通。使收書英俊得茲本板，端不負於收書矣。（饒州董應夢集古堂紹興三十年刻《重廣眉山三蘇先生文集》牌記）

胡元質刻板《兩漢傳聞》之目的，在避免如此好書「其傳之不廣」；呂祖謙奉勅編選《皇朝文鑑》一百五十卷，呂氏乃就書坊刊行之《聖宋文海》去取未精處，高文遺落處，加以增損銓次，目標在「可以行遠」。周必大為此書作序，稱「古賦詩騷，則欲主文而譎諫；典策詔誥，則欲溫厚而有禮；奏疏表章，取其諒直而忠愛者，箴銘頌贊，取其精慤而詳明者。」³⁷四者咸備，故稱：「實我宋之文也」。在南宋曾多次開雕刊行，如麻沙劉將住宅刊本、太平府刊本、新安郡齋本，傳播之盛況，正遙契「可以行遠」之初衷與目的。建陽刊刻王明清《揮塵錄》，由於獲得「真本全帙四錄，條章無遺」，此本最全，「誠冠世之異書」，故欲「鋟木以行其傳」，期使「覽者幸鑒」。饒州董氏紹興本《三蘇先生文集》之刊板，既重行校證，寫作大字，又用皮紙印造，強調「務在流通」，成為雕版印刷之主要訴求。又如：

求先生遺文，得所藏鈔本，多殘缺。明年得全集……板自閩中書窟，歲久亦訛。……遂與邑之文人共加參訂，選諸善書，鋟諸梓氏，圖永其傳焉。（孫

³⁷ 祝尚書《宋人總集敘錄》卷三，《皇朝文鑑》引，（北京：中華書局，2004.5），頁114-127。

甫〈直講李先生（觀）集序〉）

里人……嘗摹刻於家，而其間頗有舛訛，歷歲漸久，且將漫漶。輝嘗有意於校正……屬數僚士參核亥豕，因命仲子擘推次年譜，併鋟之木，庶幾有以慰子孫瞻慕之心也。（陳輝〈跋古靈先生（陳襄）文集〉）

今家藏《伐檀集》，……傳本尚未見於世。紹興中，我從兄……嘗欲盡刊我先生諸書，皆未果。……五十餘年之後，謹以是集鋟而傳之，非敢曰成我從兄之志，而太史（庭堅）「微言或絕」之懼，尚幾不泯焉。（黃瑩〈（黃庶）《伐檀集》跋〉）

麻沙鎮水南劉仲吉宅近求到《類編增廣黃先生大全文集》，計五十卷，比之先印行者增三分之一。不欲私藏，庸鑱木以廣其傳，幸學子詳鑑焉。（麻沙鎮劉仲吉宅乾道間刻本《類編增廣黃先生大全文集》，林申清《宋元書刻牌記圖錄》之十八）

孫甫雕印李觀文集，從求遺文、得鈔本、得全集，經由共加參訂、選諸善書，直到「鏤諸梓氏」，終極目標亦只在「圖永其傳」。《古靈先生文集》之家刻本，歷經校正舛訛、參核亥豕、推次年譜，然後鋟木出版，所以「慰子孫瞻慕之心」。黃庶《伐檀集》之刊印，鋟而傳之，微言可以不絕不泯。麻沙劉仲吉宅求得《類編增廣黃先生大全文集》，內容份量增多三分之一，於是雕版刊印「以廣其傳」。由此觀之，圖永其傳、傳之不絕、以廣其傳、子孫瞻慕云云，成爲坊刻本之普遍共識，所謂化身千萬，無遠弗屆，正是雕版印刷期待生發之效應。又如：

（蘇頌）平生著述凡若干卷……顯謨閣直學士張侯幾仲（近）出守當塗，欣慕前哲，欲刻之學官，布之四方，使來者有所矜式。（周必大〈《蘇魏公文集》後序〉）

以公（秦觀）之文易於矜式，搜訪遺逸，咀華涉源，一字不苟，校集成編。……板置郡庠，使一鄉善士其則不遠，可謂知設教之序矣。（林機〈《淮海閒居集》後序〉，乾道本）

紹興壬戌（十二年），毗陵周公葵……取公（陳與義）詩離為若干卷，委僚屬校讎，而命工刊版，且見屬為序。蓋將指南後學，而益永功名於不腐。（葛

勝仲〈《陳去非詩集·序》〉)

蘇頌之著述、秦觀之文章，陳與義之詩歌，多可作典範，足為矜式，故《蘇魏公文集》、《淮海閒居集》、《陳去非詩集序》，當代已刊版印行。學風士習之趨向，審美品味之選擇，從著述文集之雕印，亦可見一斑。

要之，印刷之為傳媒，化身千萬，無遠弗屆，不愧為知識流播之利器。一旦鈔本、稿本、校本、藏本，付諸雕版，則「微言或絕之懼，尙幾不泯焉」。而且雕版印刷之為傳媒，布之四方，一則在「圖永其傳」；二則可以「慰子孫瞻慕之心」；三則可以「使來者有所矜式」；四則「其則不遠，可謂知設教之序」；五則在「指南後學，而益永功名於不腐」。要之，印刷圖書存亡繼絕之功能，流傳長遠之優勢，加上斯文在茲，孺慕思齊；有所矜式，其則不遠；指南後學，功名不朽諸效益，印刷傳媒廣獲士人學者之信賴與利用，故能因時乘勢，成為圖書傳播之新寵。因此，擔心文章湮滅散佚、欲求四海傳誦，流傳久遠，唯有雕版印刷能玉成其事。騷人墨客之審美品味，攸關圖書市場之好惡取捨，而圖書版刻質量之優劣多寡，又往往為詩集傳播接受寬廣度之反應，如下列文獻所云：

《歐陽文忠公集》，自汴京、江、浙、閩、蜀皆有之。（周必大〈跋《歐陽文忠公集》〉）

東坡文集行於世者，其名不一，惟《大全》、《備成》二集，詩文最多。誠如所言，真偽相半。其後居世英家刊大字《東坡前後集》，最為善本。世傳《前集》乃東坡手自編者，……《後集》乃後人所編。……山谷亦有兩三集行於世，惟大字《豫章集》並《外集》詩文最多。其後洪玉父別編《豫章集》……皆擇其精深者，最為善本也。（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十八，〈東坡三〉）

坡之曾孫給事嶠季真刊家集於建安，大略與杭本同。蓋杭本當坡公無恙時已行於世矣。麻沙書坊又有《大全集》，兼載《志林》、《雜說》之類，……有張某為吉州，取建安本所遺盡刊之，而不加考訂……。（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十七，《東坡別集》四十六卷）

先是，汴京及麻沙《劉公（弇）》二十五卷。紹興初，予故人會昌尉羅良弼

遍求別本，手自編纂，增至三十二卷……嘉泰三年賢守育章胡元衡……訪襄陽之耆舊，欲廣其書，激勵後學。予亟屬羅尉之子泌繕寫定本，授侯刻之。（周必大《劉公集·序》）

後村以文章名天下，有《前集》刊於莆，既而《後》、《續》、《新》三集復刊於玉融，四方□□。（劉希仁《後村大全集·序》）

歐陽脩爲一代文宗，初，「其集遍行海內，而無善本」，至其後則版本繁多，《四庫提要》所列刻本有衢州、韶州、浙西、廬陵、綿州、蘇州、閩本、宣和吉本諸求；版本之多元，與圖書之接受熱絡大抵一致。蘇軾才高學博，「所作文章才落筆，四海已皆傳誦。下至閭閻田里，外至夷狄，莫不知名」；所以然者，此中有印刷傳媒發揮之效應在。《苕溪漁隱叢話》成書時（1148-1167），傳世之東坡詩文除手編本、他編本外，又有家刊本云云，所謂「其名不一」，從可見板本之繁多。陳振孫（?-1261）《解題》所言家刊本、杭本、麻沙本、吉州本，又增益若干板本。烏臺詩案之定讞，亦因「軾所爲譏諷文字傳於世者甚衆，今獨取鏤版而鬻於世者進呈」，真是成敗都因印刷傳媒。至於黃庭堅詩文集之版本，魏了翁（1178-1237）〈黃太史文集序〉稱山谷黃公之文，「江、浙、閩、蜀間亦多善本，今古戍黃侯（申）又欲刻諸郡之妙墨亭」，《豫章黃先生文集》之《內集》、《外集》、《別集》、《年譜》，於北宋元祐後，亦版本繁夥，從可見黃庭堅詩及江西詩風之風行與流行。劉歿《劉公集》，有汴京本、麻沙本、羅良弼手編本、羅泌寫定本，胡元衡爲「廣其書，激勵後學」，於是嘉泰間付梓刊峻。圖書之必求雕版者，期待「布之四方，使來者有所矜式」，其目標明確，使命具體，從可見選擇印刷作爲傳媒，自有目的與功能之考量。試看劉克莊「以文章名天下」，爲江湖詩人之領袖，其文集亦有莆本、玉融本、書坊翻刻本、巾箱本、家刻本，以及《詩集大全》諸本。其他，如楊萬里《誠齋集》、《南海集》之刊刻，亦具指南激勵，有所矜式之作用，如：

……文節楊公，以誠名齋，要亦自明。而誠苟有爲，皆若是也。人皆知先生之孤標勁節，可以薄秋霜，可以沮金石，而始終不擾。而不知先生之所以不撓，先生之誠也。人皆知先生之文如甕繭操絲，璀璨奪目，取而不竭。文以氣爲主，充浩然之氣，見諸文而老益壯者，先生之誠也。負天下之望，如誠

齋真所謂一代不數人。……東山先生曩師廣東煒叔，貳令南海，辱置門牆，益深敬慕。乃令假守通德之鄉，誠齋文集獨缺未傳。尊先生之道義，以倡儒學；表先生之志節，以激士習；發先生之詞藻，以振文……（下缺半頁）。錄木于端平初元六月一日，畢工于次年乙未六月之既望。煒叔累被朝旨，搜訪遺書，遂獲……（下有脫文）。（宋端平年間初刊初印本《誠齋集》一百三十三卷，日本宮內廳書陵部特藏珍本）

先生之詩既與昌黎並駕，則知比諸劉夢得者亦未為確論。渙幸出于先生之門，今得《南海》一集，總四百篇，不敢掩為家藏，刊而傳之，以為騷人之規範。餘四集將繼以請，則又當與學者共之。淳熙丙午十二月朔門生承事郎新權通判肇慶軍府兼管內勤農事劉渙謹跋。（宋淳熙十三年劉氏家刻本《南海集》八卷跋文，日本宮內廳書陵部藏本）

端平刊本《誠齋集》，先推崇楊萬里之負天下聲望，雕版印刷《誠齋集》，目的在「尊先生之道義，以倡儒學；表先生之志節，以激士習；發先生之詞藻，以振文……」。而淳熙本《南海集》之刊刻，之所以「不敢掩為家藏」，「與學者共之」，主要亦在「刊而傳之，以為騷人之規範」。大家名家詩文集之雕版，不僅在布之四方，有所矜式；且以指南後學，作為騷人規範。由此可見，印刷之為傳媒，意義重大，不止在知識傳播，更在於人格陶冶。在理學昌盛之時代，作為人倫之龜鑑，甚有必要。

（三）資鑑與致用、度人以金針

雕版印刷之繁榮，對於教育文化品質之提昇，效果尤其如響斯應，立竿見影。像醫藥驗方、諸臣奏議、科舉用書、古文範本，付諸雕版流傳，多可作為經世之資鑑，度人之金針，於是國子監刊印科舉考試用書，如白居易《白氏六帖》；農業技術書籍，如賈思勰《齊民要術》；治病活人之醫書，如《神醫普救方》之類皆是，切合民生日用，利用厚生，供需相求殷切，故雕版刊刻十分熱絡，如下列文獻所云：

起居舍人王鈇言：「竊見《國朝會要》備載祖宗以來良法美意。凡故事之損益，職官之因革、與夫禮樂之文，賞罰之章，憲物容典，纖細畢具，粲然一王之法，永貽萬世之傳。今朝廷討論故事，未嘗不遵用此書。比經兵火之餘，

公私所藏皆散佚。深慮歲月既久，寢成湮墜。望詔祕書省，多訪求善本，精加讎校。」從之。（《宋會要輯稿·崇儒四》，紹興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右集驗方五卷，皆予平生用之有著驗，或雖未及用，而傳聞之審者，刻之姑孰，與眾共之。乾道庚寅十二月十日番陽洪遵書。（《洪氏集驗方》，林申清《宋元書刻牌記圖錄》圖十四，頁35）

臣竊惟國家治亂之原，繫乎言路通塞而已。……慶曆元祐諸臣，其詞直、其計從，而見效如此；熙寧紹聖諸臣，其言切，其人放逐而致禍。然則國家之治亂，言路之通塞，蓋可以鑒矣。臣不任惓惓之誠。（趙汝愚《進皇朝名臣奏議》序，北京大學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校點整理《宋朝諸臣奏議》附錄，頁1724-1725）

今將呂氏家孰手抄《武庫》一帙，用是為詩戰之具，故可以掃千軍而降勍敵。不欲祕藏，刻梓以淑諸天下。收書君子，伏幸詳鑑。（宋佚名《東萊先生詩武庫》，《宋元書刻牌記圖錄》二十五）

正宗云者，以後世文辭之多變，欲學者識其源流之正也。……夫士之於學，所以窮理而臻用也。文雖學之一事，要亦不外乎此也。故今所輯，以明義理，切世用為主。其體本乎古，其指近乎經者，然後取焉；否則，辭雖工亦不錄。其目凡四：曰辭命、曰議論、曰敘事、曰詩賦。今凡二十餘卷云。（真德秀《文章正宗》自序，紹定執徐之歲（五年，1232年））

《皇朝會要》「備載祖宗以來良法美意」，其中之因革損益，值得借鏡度人者極為豐碩，「今朝廷討論政事，未嘗不遵用此書」，確實是「粲然一王之法」，值得「永貽萬世之傳」；因此，祕書省應訪求善本，校讎刊行。就醫藥方劑而言，著驗有效者最可寶貴，故《洪氏集驗方》牌記稱此方，「刻之姑孰，與眾共之」，治病救命良方付之雕版，最切淑世致用。趙汝愚彙整北宋名臣奏議，有「其詞直而見效」者，亦有「其詞切而致禍」者，原原本本，類聚群分，「國家之治亂，言路之通塞，蓋可以鑒矣」，明言編纂刊行宗旨，在提供經世資鑑。由於切於經國濟民，因此宋代刊刻頗多，有蜀刻本、閩刻本；蜀刻本雖無傳，然閩刻本傳播海內外者，

至今尚有二十餘種。³⁸《東萊先生詩武庫》，為科學考試用書，「用是為詩戰之具，故可以掃千軍而降勍敵」，「不欲祕藏，刻梓以淑諸天下」，度人以金針，在考場上旗開得勝，雕印之意圖與目的，最為明顯與切實。理學家真德秀編選《文章正宗》，作為研習古文之範本，宣稱：「以明義理，切世用為主」，旗幟鮮明，宋末至明人奉為圭臬。咸淳丙寅（1266）梁椅曾「裒全文刊之學官」；劉克莊等曾刊於番禺，其他，又有越本、莆本等等。版本之多種，可以推想流傳接受之廣泛。古文範本而「明義理、切世用」，又提示度人之金針，故雕版傳播符合供需相求原理。

詩話之編纂，或記錄閱讀心得，或分享創作經驗，或提出文藝主張，或品評作家作品，不一而足。要之，皆熱衷提示欣賞之津梁，不吝指稱度人之金針。詩話專書及總集之交付雕版刊行，此種意圖尤其昭然若揭。從下列三大宋代詩話總集看來，確實如此。先看阮閱《詩話總龜》之自序：

噫！是書之成，上可以諫君父之尊，中可以示簪纓之貴，下可以諭諸門庭與夫閨闈之邃，以至山林之隱德，僧道之高流，亦皆有以諷咏而警戒之。其于干教化，勵風俗，殊不淺淺；非若妖詞豔曲，蝶語淫言，入人肌骨，牢不可去，久而與之俱化者也。乃若苦吟之士得之，可以臻奪胎換骨之妙；好談之士得之，可以擅垂河吐屑之敏；修進之士得之，可以激昂壯志，助飾文彩；閑居之士得之，亦可以陶冶靈襟，遣適光景。……既而不欲祕藏，乃授諸好事者攻木以行，與天下共之，孰云其不可哉？（阮閱《詩話總龜》序，紹興辛巳，載明抄本中）

阮閱評價《詩話總龜》成書之效應有二，其一，經世資鑑，有益教化，所謂「上可以諫君父之尊，中可以示簪纓之貴，下可以諭諸門庭與夫閨闈之邃，以至山林之隱德，僧道之高流，亦皆有以諷咏而警戒之，其于干教化，勵風俗，殊不淺淺」。其二，金針度人，各取所需，所謂「苦吟之士得之，可以臻奪胎換骨之妙；好談之士得之，可以擅垂河吐屑之敏；修進之士得之，可以激昂壯志，助飾文彩；閑居之士得之，亦可以陶冶靈襟，遣適光景」，有此效益，乃「攻木以行，與天下共之」。

³⁸ 北京大學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校點整理《宋朝諸臣奏議》，陳智超〈序〉，四、〈《宋朝諸臣奏議》的版本及其流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12），頁12-13。

《詩話總龜》初名《詩龜》，編成於徽宗宣和五年（1123），當時大約尚未有刊本；直到高宗紹興年間，閩中始有刻本。宋末元初方回看過七十卷本宋刻，與明代傳抄之百卷本不同；可知《詩話總龜》在宋代，除稿本、抄本外，最少有兩種雕版刻本。從其編書旨趣，在提示詩法，助飾文彩，於南宋江西詩派風行之際，供需相求，刊刻本當不只兩種。胡仔於紹興丙辰（六年，1136），聽聞阮閱《詩總》；後十三年（紹興十九年，1149），獲讀此集，不知寫本或印本。³⁹其後胡仔編著《苕溪漁隱叢話》，乃繼《詩話總龜》而作，著書之旨趣，欲扶持詩道，觀詩知美，如云：

噫，前後集共一百卷，亦可謂富矣！余嘗謂開元之李、杜、元祐之蘇、黃，皆集詩之大成者，故群賢於此四公，尤多品藻；蓋欲發揚其旨趣，俾後來觀詩者，雖未染指，固已能知其味之美矣。然詩道邇來幾熄，時所罕尚；余獨拳拳於此者，惜其將墜，欲以扶持其萬一也。嗟余老矣，命益蹇，身益閑，故得以編次，終日明窗淨几，目披手抄，誠心好之，遂忘其勞；蓋窮人事業，止於如斯，雖有覆瓿之譏，亦何恤焉。丁亥中秋日，苕溪漁隱胡仔元任敘。

（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序）

綜考其實，胡仔《苕溪漁隱叢話》一書乃宗宋詩話體系，標榜杜詩，推崇蘇軾、黃庭堅，杜、蘇、黃三家於《叢話》所佔篇幅凡 32 卷，佔全書 32%，可知其詩學祈向。⁴⁰故胡仔於《叢話後集》之自序宣稱：「余嘗謂開元之李、杜、元祐之蘇、黃，皆集詩之大成者」；著書之旨趣，經由詩話中群賢之品藻，「蓋欲發揚其旨趣，俾後來觀詩者，雖未染指，固已能知其味之美矣」。詩話之傳播，將促使後來觀詩者，知味賞美；如此，將可挽詩道之將墜，可以「扶持其萬一」。郭紹虞《宋詩話考》曾稱：「宋人談詩，要之均強調藝術技巧，罕有重在思想內容者」；⁴¹《苕溪漁隱叢話》自不例外，故胡仔所謂詩道、詩美，當指經由詩話品藻之杜詩、蘇黃詩，而悟作詩法門。由是言之，亦視詩話為金針度人之媒介。《苕溪漁隱叢話》100 卷

³⁹ 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自序，時孝宗乾道三年（丁亥，1167），（臺北：長安出版社，1978.12），頁 1。

⁴⁰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 6-卷 14，〈杜少陵〉；卷 38-46，〈東坡〉；卷 47-49，〈山谷〉。《後集》，卷 5-8，〈杜子美〉；卷 26-30，〈東坡〉；卷 31-32，〈山谷〉。李白於前後集，只有 2 卷之篇幅。

⁴¹ 郭紹虞《宋詩話考》，《詩病五事》考，（北京：中華書局，1985.4），頁 10。

之詩學價值，遠在《詩話總龜》之上，當時版本流傳必然多元而興盛，北京圖書館、北京大學各藏有殘宋本，兩本不相混雜。

宋人所編著詩話，流傳於世者 40 餘種，羅根澤曾考索 126 種，而郭紹虞《宋詩話考》考述得 139 種。宋代筆記亦多論詩思、詩道、詩法；大抵強調藝術技法，提示詩道法門者多。郭紹虞考察詩話，「要之均強調藝術技巧」之言，信而有徵。宋人談詩如此，作詩亦有相同之體現；自元祐蘇、黃標榜詩法，作詩有門可入，有法可循，從此天下風從，宗宋詩話如《苕溪漁隱叢話》、《潛溪詩眼》等又推波助瀾，至南宋理宗淳祐間，魏慶之編成《詩人玉屑》二十卷，蔚為提倡詩法之典範著述，如黃昇所云：

友人魏菊莊，詩家之良醫師也，乃出新意，別為是編。……其格律之明，可準而式；其鑿裁之公，可研而覈；其斧藻之有味，可咀而食也。……蓋始焉束以法度之嚴，所以正其趨向；終焉極夫古今之變，所以富其見聞。是猶倉公、華佗，按病處方，雖庸醫得之，尤可藉以已疾，而況醫之善者哉！方今海內詩人林立，是書既行，皆得靈方：取寶囊玉屑之飯，淪之以冰甌雪盃，薦之以菊英蘭露，吾知其換骨而僊也必矣。姜白石云：「不知詩病，何由能詩；不觀詩法，何由知病？」人非李杜，安能徑詣聖處！吾黨盍相與懋之。
（黃昇《詩人玉屑》序）

黃昇序《詩人玉屑》，標榜此書之格律、鑿裁、斧藻，以為可式、可覈、可食。評價其書「束以法度之嚴，極夫古今之變」；尤其推估「是書既行，皆得靈方」之可能效應：實無異「取寶囊玉屑之飯，淪之以冰甌雪盃，薦之以菊英蘭露，吾知其換骨而僊也必矣！」《詩人玉屑》體現當時詩話風尚，再三強調詩格詩法，揭示學詩津梁，頗樹立學者詩歌創作之規範，故胡仔被黃昇譽為「詩家之良醫師」，良有以也。金人元好問《論詩三首》其三曾云：「鴛鴦繡了從教看，莫把金針度與人」；《詩人玉屑》著書旨趣，不僅引領讀者「教看鴛鴦」，更不吝提示詩道詩法，「更把金針度與人」，詩話之傳媒功能，淑世精神，頗有完滿之體現。

（四）圖書監控，看詳禁毀

鈔本寫本作爲圖書複製之方法，大抵有下列缺失與不便：一則不能滿足市場需求；再則短時間很難傳鈔大量複本；三則翻閱攜帶不便；四則流傳不廣，較易散佚；五則未經校刊，準的難依。於是從中央到地方，從官府到民間，從作者到讀者，從賣書者到買書者，包括借書、鈔書者，藏書家、閱讀者，都期盼圖書複製新技術之產生，可以化身千萬，無遠弗屆。由於社會的需求，消費的導向，雕版印刷乃應運而生。

自雕版印刷崛起，印本圖書相較於寫本鈔本，無論閱讀、研究、攜帶、流通，甚至於書價、傳播，皆有許多「便於人」的傳播功能；印本發行數量龐大，圖書版本多元，由於書價低廉易得，裝幀印刷賞心悅目，所以廣受讀書人歡迎，能夠滿足市場需求。不僅化身千萬，無遠弗屆，而且資訊傳播迅速，影響層面廣大而深遠。印本崛起，與寫本並行，對於知識之傳播與接受，圖書之流通與典藏；閱讀之態度、研究之視角、創作之方向、學術之風氣，在在都有其影響；對於科舉之取士、書院之講學、教育之普及、文化之轉型，筆者以爲：多與印本之繁榮發達有關。印本之崛起，筆者稱爲知識之革命，上述課題，多值得深思與探討。

不過，話說回來，翻檢宋代有關文獻史料，明顯稱賞、充分肯定雕版印刷之功能者十分有限，或者民生日用而不自知，或者習慣成自然而不自覺；總之，直接正面、明確詳實之推崇雕版印刷之功能者不多。相形之下，朝廷對書坊雕印圖書之監察管控，文獻資料反而較豐富。⁴²梳理資料，考察問題，發現朝廷爲了中央集權，統一政教，對書坊雕刻圖書，大抵採取四大手段：一、以洩露機密爲由，實施看詳禁毀；二、以搖動眾情爲由，進行監控除毀；三、文集日記牽涉威信、機事、異端、時諱，毀板禁止；四、科舉用書，爲杜絕懷挾僥倖，禁止施行。制定法律、頒布規章，以規範各種傳播活動，向來爲政治控制傳媒的一種主要形式，古今中外幾乎毫無例外。⁴³朝廷對雕版之禁令僅管嚴切有加，結果「禁愈嚴而傳愈多」，「禁愈急，

⁴² 李致忠：〈宋代刻書述略〉，（四）宋代刻書的禁例，宋原放、王有朋輯注：《中國出版史料》（古代部分）第一卷，（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10月），頁348-358。

⁴³ 陳力丹《傳播學是什麼》，八、〈無形的網絡——傳播的社會控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3），頁253-255。

其文愈貴」，何也？⁴⁴吾人不妨作逆向思考：雕版圖書若非有化身千萬之可觀數量、無遠弗屆之流通領域、迅速便捷之傳播效率，以及對世道人心、學風士習之深廣影響，朝廷當不致監控、甚至禁毀如此。關於朝廷對書坊雕印圖書之監控，已撰成專文，⁴⁵為省篇幅，不再贅述。

要之，朝廷對於雕印時政邊防文字，實施看詳禁止；⁴⁶對於刊行異端邪說，妄作惑眾者，進行監控除毀；對於印行會要、日錄、元祐學術，毀版禁止；對於科場懷挾書冊，為杜絕僥倖，亦禁止施行。朝廷對於觸犯忌諱之雕版圖書，視同洪水猛獸，必欲治除之而後快。筆者以為，主要是震懾於雕版印刷之質量輕便，傳播快速；以及化身千萬，無遠弗屆之傳媒效應。試考察《宋會要輯稿》大觀四年，朝廷處理「妄作朝報」事件，描述朝報「始自都下，傳之四方」，「流布近遠，疑誤群聽」，則其傳媒效應不可小覷。其他，禁止邊機文字，謂「鏤版鬻賣，流布於外」；「流布漸廣，傳入虜中」；「本朝印本文字，多以流傳在彼（遼）」；「筆之書，鋟之木，鬻之市，泄之外夷。事若甚微，所關甚大」。禁止奏疏刊行，則謂「傳播街市，書坊刊行，流布四遠，事屬未便」。禁刊曲學邪說，則謂「散在諸路州軍，使良民亂行傳誦，深為未便」；「諸路書坊擅自印行，以朦朧學者，其為害大矣」；「無使國之機事，傳播閭閻，或流入四夷，於體實大」；「別集眾製，鏤版已多；儻許攻乎異端，則亦誤于後學」。在嚴格看詳除毀之禁令下，並不足以扼止雕版「日傳萬紙」之流布，誠如朱弁和楊萬里所言，朝廷既禁印東坡詩文，然「禁愈嚴而傳愈多，往往以多相誇」；「其禁愈急，其文愈貴」。此乃雕版印刷化身千萬，無遠弗

⁴⁴ 天文與兵書，是太祖至仁宗百年間禁書的兩大主題，「不得藏于私家，有者并送官」；「匿而不言者論以死，募告者賞錢十萬」，由於載於《宋刑統》，又聖諭下詔再三，因此，不可能有雕板機會。參考安平秋、章培恆主編：《中國禁書大觀》，三、〈文治的陰影：宋代禁書面面觀〉，（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0.3），頁 34-37。

⁴⁵ 張高評：《印刷傳媒與宋詩特色——兼論圖書傳播與詩分唐宋》，第二章〈宋代雕版印刷之繁榮與朝廷之監控〉，（臺北：里仁書局，2008.3），頁 29-84。

⁴⁶ 南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八十九，元豐元年（1078）四月庚申條：「諸榷場除《九經》疏外，若賣餘書與北客，及諸人私賣與化外人書者，并徙三年。引致者，減一等，皆配鄰州本城，情重者配千里。許人告捕，給賞。著為令。」（北京：中華書局，2004.9，二刷），頁 7068；參考張希清等主編《10-13 世紀中國文化的碰撞與融合》，劉浦江〈文化的邊界——兩宋與遼金之間的書禁及書籍流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1），頁 138-163。

屈之效應；若是寫本抄本遭遇禁燬看詳，必然萬劫不復，靡有劫餘。

三、結論

本論文嘗試運用宋代史籍、詩話、筆記、文集、題跋、牌記之印刷史料，尤其如《宋會要輯稿》、《續資治通鑑長編》、《宋大詔令集》、《宋史》、《全宋文》、《宋元書刻牌記圖錄》等印刷文獻，參考目錄學、版本學，以及張秀民《中國印刷史》、錢存訓《中國印刷文化史》等書，借鏡西洋傳播學理論，從控制研究與效果研究之視角，考察雕版印刷之政治使命與教育目的，大致獲得如下之觀點：

- (一) 圖書複製之技術，從「倩人假手、躬自抄錄」，以抄書為讀書之寫本時代，發展到「日傳萬紙」，「士大夫不勞力而家有舊典」，「今板本大備，士庶家皆有之」；「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於是「鈔錄一變而為印摹」，以印本替代寫本，具有「事什而功百」之效。印本之優長，在「易成、難毀、節費、便藏」，以及化身千萬，無遠弗屆。印本簡約輕省如此，對於知識傳播，必然引發許多效應。
- (二) 宋代號稱雕版印刷之黃金時代，兩宋三百年間，刻書之多，地域之廣，規模之大，版印之精，流通之廣，都堪稱前所未有，後世楷模。官刻本、家刻本、坊刻本之競奇爭輝，加上稿本、抄本、藏本之相得益彰，圖書作為知識傳媒，勢必生發若干前所未有之反饋或效應。印刷傳媒與文學、經籍、史書、理學間，由於閱讀接受、審美品味，以及商品經濟關係，亦交相作用，互為因果。
- (三) 宋代雕版印刷之目的與使命，大抵有四端：朝廷右文崇儒，自太宗真宗仁宗皇帝，多極力推廣雕版印刷。印刷圖書之使命，主要在「宣索賜予，興教濟眾」；高宗紹興朝更踵事增華，有所廣益。家刻坊刻則因時乘勢，功利務實，或為鄉紳，或為碩儒刊行詩集文集，期許「布之四方，圖永

其傳」。官刻坊刻之經史群書，或以之致用資鑑，或以之金針度人；至於觸忌犯諱之坊肆刊本，朝廷往往進行圖書監控，看詳禁毀。

- (四) 宋代雕版圖書，館閣國子監提倡「興教濟眾」於上，家刻本坊刻本響應「布之四方，與天下共之」於下，無遠弗屆，圖永其傳，成為印本圖書之使命與目的。而淑世資鑑，利用厚生；良法美意，度人金針，更為朝野所歡迎。印刷傳媒此種「議題設置」之凸顯，有助於權力團體通過社會控制之微妙形式，發揮既定之影響，生發一定之效應。何況雕版圖書作為商品經濟，供需相求，有利可圖。
- (五) 朝廷對於圖書監控，不惜實施看詳禁燬，理由不外：「鏤版鬻賣，書坊刊行：傳播街市，流布近遠，始自都下，傳之四方」，其生發之效應，令朝廷震懾禁止，卻使士人閱讀印本，喜愛接受，以至「禁愈嚴而傳愈多」。吾人嘗試反向思考，則雕版印刷之傳媒效應，可以推想而得。